

馬楚堅／著

明清邊政與治亂

王鍾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明清邊政與治亂

馬楚堅／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 001 号

明清边政与治乱

马楚坚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3.75 印张 2 插页 805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201—01548—6/G·731

定 价:38.00 元

原原本本考信傳真
大業所繫厥曰安民
載之書錄奕奕精神
卓哉此編世莫與倫

羅香林書



扶發隱微尋常史迹得
椽筆而益生光彩

羅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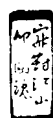


俯仰千年人与事
柔生剴切
理常然
靈臺明澈
知有古
老氏不為天下先

楚堅仁弟屬書

丘山





楚堅教授自勵句

揮鋤險徑
荆棘



擊斃
總高
衢策
驂騑

東官陳士恒書



來作淺

斗低唱

調清風

明夜說

春煠

揮劍陰陰掃荆棘攬

高鄉朱歸宿世燈名授

少作不居不尤辭幸未

忘史事掩聞一六動哀喜

輻三內參附驥尾小右傳七

絕題事立西

癸酉清和都

序

《明清边政与治乱》一书，是香港马楚坚先生的论文结集。我拜读了全部文稿，深感到，这本集子主题明确，是从不同角度分别论述了明清两代有关边防边政的问题。在时间跨度上，又相对集中于自明中叶嘉〔靖〕万〔历〕以迄清中叶雍〔正〕乾〔隆〕这一段，即从公元十六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末叶约二百年。这一阶段，既经历了明清两大帝国的交替，又迈越过了明朝国势中衰以至败亡，清朝勃兴入主中原，趋于全盛的过程。以前期的边防边政言，是主要针对明金〔清〕军事对峙拉锯、兵凶势危而采取的部署；以后期言，则由于清代明以兴，为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而推行的边务措施。由于形势遽变，两个政权的处境不同，故其在边防边政的政策和着重点也大相迥异，一则是着眼于救亡图存，着力于建立北线防御的体制；一则是在东南严防明郑势力的攻扰，在西北致力于建立和健全对蒙古、新疆的稳定统治秩序。即使明清着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充分重视边防边政则是一致的，均认为是本政权兴衰存亡的关键所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对边防边政的措置是否及时和有效，实反映着国势的强弱和朝政的治乱，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权的边防边政，都是各该政权经济、政治、军事力量的综合体现，又是它的国防战略决策和对边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践。故此，从来就不存在可以脱离时空，可以脱离特定政治形势而侈言边政，也不允许单纯从军事角度论述边防。楚坚先生这本著作突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他总是将有关的专题研究置于各该时期政局战局的总体中进行考察，总是将有关边政边防的问题作为一定政策和战略的产物，并受到政局战局发展变化的制约，本集以《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一文作为带头，正是为了从宏观上展现当时的时代特点和时局走势，由此可以有助于对其他问题的理解。明中叶以后，国力明显衰退，在军事上，作为军队主力的京营日趋腐败，卫所制也逐渐蜕变成空壳，具有高度运动机能和强大威势，可以长驱直入荒漠的野战大军已经不复存在。面对北线的强敌，只能以守为战，将防线的内移，派遣大员坐镇九边，依靠修筑长城墩台沿边布防，放弃主动进攻，改为被动的自卫防御。为适应这样的体制和部署，就不能不大力加强驿站塘报，以作为侦察警戒和上报紧急军情，下达军令的主要手段。正如作者所强调指出的，“塘报系统之组织与扩张，起于国防、战阵之需要。是因其消长，始终随国防态势之变而有权宜精神存在。”本集收录的《明代塘报之创生及其编制》、《明代塘报的运作与功能》两文，正是以大量事实材料对此一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从此一侧面衬托出当时的边塞战云与军书旁午，两方的攻防线备。由于作者引用了两岸先后公布的有关历史档案资料，从而能在比较扎实，事实材料基础上，形成新的论点，提出新的论据，拓深了前人的研究。与此性质相同，同样能有力地反映明代中

后期军事体制的歧变,是《明代的家丁》一文,这里所说的“家丁”,绝不是一般性为家主服劳役,供奔走的家内奴仆,而是一种变相的亲军。由于军事结构已在很大程度上败坏,部队的兵源和编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按照军籍黄册的记载,被列为“军户”的人丁本应“世代服役为军”,但因为逃匿者日多,勾补不易,各级部队严重缺额;一些军丁虽被强迫勾补而来,但既乏战志又无战力。边关统帅只好就近募兵,招募而来的兵员实际上已逐渐成为明军的基干。统兵大员以至文武官佐,为进一步指挥方便和自卫,又往往各自选出一部分军事素质较为优秀,又能对己忠忱,必要时能效力死战的军士转为“家丁”。这种类型的“家丁”,实质上已经是“家兵”,是对“家主”惟命是从的嫡系部队。官兵之间建立起这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虽然一时曾较有效地满足过某些战勋任务的需要,但它同时又是进一步瓦解原有军事体制的腐蚀剂。它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开始出现以迄明亡,几乎存在了二百年之久,只能说是为因应异常形势而产生的不正常现象。对“家丁”的性质、源起、地位、作用、特点等,楚坚先生均作了有理有据的论述。

明金对峙,曾进行过极为激烈和频繁战争。从战场态势言,满族的军事力量由弱趋强、迅速壮大,逐渐取得明显的优势,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率新兴的擅长骑射的八旗精锐,曾连续猛攻明朝的防线,一再破关入塞,取得过赫赫的战果。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萨尔浒一战歼灭了大量明军,战场的态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金已稳占优势。明方掘壕固守,据城抵抗,所以仍能坚持相当时期,主要是因为人事上任用过一些具有较高战略眼光和军事指挥能力的将帅,诸如袁崇焕、熊廷弼、孙承宗等人,他们较能从实战出发,较能清醒地知己料敌,并相应调查部署,大力加强战备。在这当中,特别是适时引进和仿造了大量的西洋佛郎机大炮,用以装备辽东各军,利用其射程远、杀伤力大,可以有力地防守阻击。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一战,袁崇焕即因使用“西洋巨炮”,击退了连续猛烈攻城的后金军,不但取得了退敌解围的战果,而且“歼敌无数”,连亲自率军攻城的努尔哈赤本人亦承认,此战为他有生以来未有的大败,不久便“蓄愠而患疽死。”此亦说明,“是否使用当时最新的军事技术以装备军队并用于实践,是会在一定战役中扭转局势的。当然,单纯依靠装备上的暂时优势,并不可能长远地决定战争全局,明王朝颓败之势也并不会仅因此一因素而深逆转。”楚坚先生论《西洋大炮对明金态势的改变》一文,具体评述了明金两方在军事、政治、用人选将以及战略、战术多方面的对比,而且恰当地评估了使用新式火器在军事史上的重大意义及其局限,是从另一方面对当时边疆研究的充实。

明清交替,其斗争是极其激烈和复杂的,它不仅是一个军事胜败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民族关系、传统意识形态、正统观念等多方面的冲突。明末殉国英烈之事,南北殊死抗争之烈,在前此历史上政朝换代之际都是罕见的。清王朝虽然在顺治之年(1644年),即已定都北京,宣布君临天下,但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却迅速集结,进行坚决的反抗。一时风起云涌,此伏彼起,分别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坚持进行复明的搏斗。这方面的政治、军事激烈对抗,曾先后延续了四十年之久。相继被拥立的几个南明小朝廷都自称继承朱明皇绪,与此有联系的郑成功父子又在台湾仍奉永历正朔,高揭反清的旗帜以号召多方,并多次率军入扰东南。更有甚者,一些降官降将又时降时叛,一度酿成震动半壁的大动乱。反映斗争的尖锐残酷,清王朝不惜采用过多种苛严的镇压手段。楚坚先生所撰《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愆期试探》、《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以广东为例》、《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

节》是一组有特色的文章。它着重评述当时在东南沿海边陲发生的几樁史事，从这些方面反映出当时为推翻和为捍卫清朝统治斗争的炽烈程度和复杂性，军事颠覆和军力镇压，通海和禁海，双方〔多方〕的不同政见和军事对峙，反清事实力集团内部之间的联合和矛盾，某些主持气节与上述演变过程历史人物的表现和个人特点等等，在文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析和评价。作者在这一组文章中较多地使用闽、粤出土材料，具体地揭明因兵连祸结，而又特别由于执行迁海禁令所给予当地人民沉重苦难。他又以重笔浓墨叙述了明季内阁大学士何吾驺其人其事，对于何氏的史迹活动注意勾沉发隐，在诬辨伪，使此一尽瘁国事，不惜以身殉志的历史人物重现于史篇。但从这组文章也可明白看到，朱氏南明几个小朝廷，无非是明朝腐朽政治的延续，兵临城下尚还酣醉于歌舞昇平，大敌当前尚还操切于攘利争位。它们绝无能力摆脱内部互相倾轧哄争，互相抵消力量的可悲局面，期待它们之中任何一个能够奋发中兴，重新收拾旧山河，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想。郑成功、李定国、何吾驺等虽然表现出最高的忠忱，尽了最大的血诚，但也只落得壮愿难酬，赍志以终。他们的事迹必永垂青史，但他们的努力却只能为明王朝终难倖免灭亡共同谱写着一曲挽歌！

大力经营内、外蒙古和新疆，加强中央朝廷对这些地区的有效统治，密切内地和边陲各地的交流联系，是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最为重要的边政建设，而这方面重点措施之一，就是普遍创建伸延到各地的驿远台站和邮路，组构成网络式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在当时条件下，建立和保证驿邮塘道的畅通，也极有利于在必要时调动军队，巩固国防。为此，清朝政府曾因地制宜，明确划分线路，规定台站的数量和定点，彼此的距离，设置专职官佐，配备马夫、驿卒以及必须的车船马匹，对于传递里程、期限、职责奖惩等亦均载入章程，甚至还不惜远从东北分批调遣数以万计的少数民族官兵（如锡伯族），连同眷属迁入新疆，用以充实边陲沿线的人力。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对此都耗费了大量心力，并一再亲自进行部署指挥，现存满、汉文《朱批奏折》有着大量的重要记载，边塞建设一直是被认为国家大政不容忽略的一部分。事实上，清代在这方面的建设规模及所取得的成果，均远远超过前此的任何朝代，显示着盛清大一统的鼎盛和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本集收录的《清代内蒙古台站路线之创置》、《清代外蒙古台站路线之创建》、《伊犁御塘道之创置与新疆开辟之关系》、《清代西北口外至伊犁台站路线之创兴》等四文，分地区分路线，将干道、分道、台站分布及建立时期、区间道里、邮程以及前后建制组编，一一进行订正，并制表列明，极便于溯本追源，了解一代制度的兴废。楚坚先生充分肯定了清王朝在这方面“统治政策的成功”，誉之为“杰作”，认为此对祖国幅员之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对经济的发展，及对国防力量的加强等，均提供了重大的贡献。对于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是经过认真的稽考才得出的审慎结论。

本集所收录的文章，选题一般比较专门狭小，但因斑见豹，却直接连系到当时的全面政局。唯其选证较专而窄，就不可能泛泛而论，草率完篇。写作这样的论文，在搜集和订正史料，参照和核实前人成果，构思之论等方面，都必须进行更独立更细致的钻研思考，甚至必须要做大量的近于烦琐的工作，需要付出扎扎实实的劳动。我认为作者治学的态度是严谨的，是尊崇实学，不尚空谈，是能够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而不作过份引申的。小处着手，不逃避具体的艰苦的工作；大处着眼，不受拘束于本专题的狭窄内容，是所谓微观与宏观的结合。生题熟做，小题深造，往往由此显出功力。本集之所以能达到高的学术水平，

我认为正是因为作者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由于作者长期在香港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海内外学术讯息和资料比较方便，本集中所载的各文也是曾分别在大陆、台湾、香港三处的学术刊物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的。作者注意到大量征引三处近年公布的新资料，参照海内外学者新的学术成果，吸收为自己的学术营养，充实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也是很好的。

楚坚先生正当盛年，以当前已取得的成果作为新的起点，必能在史学园地上取得更大的硕果。我诚恳地期待着。

是为序。

韦庆远

一九九二年端午节写次香港大学

序

马楚坚先生为一年青之学者，文学、史学皆有相当造诣，所发表之学术论文已逾百篇，于明清制度史，明清边政史、经济史、族谱方志方面颇有阐发。近日天津出版社选辑其专题论文十余篇，编集成书，名为《明清边政与治乱》。上周马先生将此书校稿呈余，征询鄙见，并请为其作序，乃欣然序其书焉。

其书约六十余万字，分为五组，其中论文，如《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明代摭报之创生及其编制》、《明代摭报的运作与功能》、《明代的家丁》、《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节》等乃为演讲稿修订而成；余则为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而撰写之论文。每篇章节清晰，自成体系，叙述详简，抉隐征实，悉合史法。而其所据史料，皆以第一手为主，故能若广角之镜从不同角度照见历史迹象，可谓别具卓见，堪称佳作。

本集部分近作，为其与余时相过从讨论者，乃其求真求实之精神及对史乘之认识，别有所感而撰成。安南与广西边界少数民族问题，为明王朝头痛大政之一，自永乐以后皆无法将其彻底解决。马氏与余曾加讨论，其后不久竟成：《翁万达机权决策与经略交广》一文。作者从当时经济、军力衰颓与政局、时议、战局之总体中进行考察，论述翁氏因应于此而发展出而又及时、有效之边政新措施，于借权随机决策，推行中得以集饷不尝，陈兵不试从而坐消巨患；为有明一代唯一能功收不战之兵家，所论甚是。实可对当时边疆史作一补白。《青海归清的历史转折与突破》一文，则是从另一角度，论述清王朝因与西藏互相依赖之关系，得以间接管理青海。迨真假达赖喇嘛事件出现，西藏青海关系遂疏远，引至罗卜藏丹津为谋顾实汗传下之汗位而叛清之行动，因而为雍正造下平叛及突破历史局限，彻底将青海纳入直辖体制中之始末，所分析甚中肯，均言之有据。《近十年来中国研究明代蒙古史之回顾》一文，打破传统写法，将资料纳入历史分期与历史发展而突出每位研究者于各该段历史发展之贡献，也是值得推许者。又附录何吾驺墓铭已毁于文革，当今仅马氏藏有该铭文，可说十分珍贵。马氏所撰文章，甚得吾心，本拟逐一述评其与时代独特得失处，于本年八月“第三十四届亚洲及北非洲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后，予以整理成文。及见韦庆远教授之序，知余所欲言者，韦教授多已先我言之，兹不复赘。

研究历史，不可过于侧重断代，应该效法古人“博古通今”之教；专题不可只重事件，而忽略时代背景及体制功能之运作，如此始能利用史料以了解时、人、事之交织于变动中之真面目。马氏便是能掌握此一关键，小题大做，发挥其通达之知识面，一连串运用直接

史料写下本集中各篇，足以为历史填补空白，或抉发隐微，为正史纠正含混与错缪者，是其著作实已达甚高之学术水平。古人有“立言而功德兼备”之说，则马氏之志立思齐也将不朽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马氏之努力所得，取其一隅小结于此，愿其以此为砥砺、勤褻绩之起点，继与时阴竞赛，则为吾所期也。

赵令扬

于香港大学中文系一九九三年五月十八日

自序

吾国文化渊博精邃，编存典籍。古者文史合一，诗、书、易、礼、乐、春秋，亦文亦史，此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也”。黄帝之时，已置史官，自后历代相沿，无不以史学为重；至于文学、金石所刊，风谣所录，光辉四播，更无论矣。经史分治始于汉代，治经者，以史为贰，治史者，以经为副，相辅而成，流风所被，莫不承之。今日大学，文史多分所、系，然典籍则多相通。治经之余，兼顾史籍，则疏略肤浅之蔽祛矣；治史之余，兼究文学，则文采声韵之美彰矣。惟典籍之繁，新学之富，比前不啻倍蓰，若仍墨守旧法，则诚故步自封也，然如何突破？求解惑于蒙师何公丘山先生。曰：“今之学术，贵由博而约，浸淫日久，自得其三昧。约者史学方法也，今香江学人罗香林、王尔敏先生等乃其中巨擘，吾曹当以追从其治史精义。”夫子逸士也，一生惟重国粹，精通四部，文出桐城，诗近田园，四六得骚风神韵，庾赋怀国美旨，旁通三教，为一通儒。坚生也鲁，虽因缘得侍门下，然习经学诗文，无一有得，愧而欲颓！幸师发掘坚略有治史之赋，诱其立志思齐于实斋，法其治学屹立不倦以求战胜一己之极限冀谋突破之精神。自是心舟之舵为之见焉而定航。感而草一联自为励志座右铭：“挥锄险径披荆棘，挽轡高衢策驂骝。”

有心人天不负，如愿先后得缘立雪于罗、王之门。二公一代大家也，各有所专，然皆以其博大识见，贯通中外古今史学义法，抒发治史之精蕴，善陶钧疏濬，导来学于正轨。其传习由博而约之法，如万丈高楼从基起，激坚自发为丈夫手执吴钩志。自后传习沃享之趣无穷，乐此不疲，视野为之阔，文章格局为之一变，乃渐入学术领域之边，乐为垦荒农矣。惜坚少孤家贫，从学但凭毅志于半工半读，学基欠固。性鲁不敏，悟力不足，虽有诸位“灵魂工程师”悉心裁毓，导向学术之林，奋而补拙于公余二十秋，冀能画出人生彩虹以馈恩师，然所得无几，能不愧焉！今幸得出版社代坚罗集先后发表于中、台、港三地之拙文十余篇，名为《明清边政与治乱》，所收文章非有何真知灼见或可举道之全也，仅个人私得而已。发表之初，乃因治史有所触见，草而成文于垦荒中，一则欲就教时贤君子予以正之及增一己之视域，另则存之以备异日考验之资，作为跟进深钻之泉源，庶或可求其由一偏之见而近于不可必得之全。今既结集，无暇跟进修正，仅有将发表时受浓缩或漏缺者予以补之於此；因有所蔽，见之不能无偏，而修辞欠顺，赘语疣言处处，可论者尚多，此固个人学力有所不逮所然，惟此等作品乃受诸师启沃，得袭其治学精神，不自量力垦荒园死而后已之文化心态中耕耘所获之果。其果之圆通岂敢苟同如编者之推为“创见独具只眼，持论通达，编行问世，足以餐同好，嘉惠学子，诂有涯矣”之誉，此乃诸师荫下至今始完

成于垦耕务滋有得之传习功课更为意义深长。为此，特以此集献诸□师长，作为迟交之课业，亦借此求教于大雅君子，以祈得所赐正其所蔽所偏，藉之概见其全，是则所馨香合什者也。

楚坚生命历程转捩，固赖何、罗、王三位恩师，而其他良师之教，获益亦良多，扶掖厚爱者众，若李公幼椿、宋公晞、苏公莹辉、章公群、刘公家驹、杜公维运、涂公公遂、王公韶生、赵公令扬诸先生，限于篇幅，难以一一言其赐益矣。今日得以学能顾及多方，以资调剂，融汇贯通于自垦范畴内外者也，谨此并以识敬。

拙集承王鍾翰先生鼎署，饶宗颐先生、陈士恒先生、陈树衡先生贻予墨宝，赵令扬先生、韦庆远先生赐序，曹国庆先生贻跋，师友荐刊，感激之至！协校良朋，切磋好友，合志谢忱。王师尔敏先生原拟赐序并批诸篇得失，以启迪其深研新径，惜遭车祸养伤而中辍，然病中仍屡以为念，师爱如斯，能不铭诸永久！罗、何二师生前赐有题辞，今恭置卷首，以资敬之念之！初，无意自序，旋以王师序文留出版位，不得不草序以填充白。仓卒为序，容多不知所云，尚祈 大雅读者、师友见谅指正为鉴。

一九九三年初寒马楚坚序于香港。

目 录

书名题署	王鍾翰教授
题赠墨宝	故罗香林教授
.....	饶宗颐教授
.....	故何丘山教授
.....	陈士恒先生
.....	陈树衡先生
序	韦庆远教授
序	赵令扬教授
自序	马楚坚
明政由治入乱之关键	(1)
翁万达的机权决策与经略交广	(29)
明代塘报之创生及其编制	(58)
明代塘报的运作与功能	(90)
明代的家丁	(124)
西洋大炮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63)
明末何吾驺相国之生平与志节	(189)
郑成功应李定国勤王愆期试探 ——兼析南明屡奋不振之由	(226)
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以广东为例	(257)
清代内蒙古台站路线之创置	(278)
清代外蒙古台站路线之创建	(318)
伊犁御塘之创置与新疆开辟之关系	(390)